

文化转型与学科发展取向

刘亚敏 夏施思

摘要: 依循“文化—教育—人”的逻辑关系,思考文化转型对人的发展施与的影响,从而审视学科发展取向,有助于学科建设从思维到行动上做出最具发展性的决定。文化转型彰显了由主体性、开放性、创造性、多元性、整体性、关联性、相对性等文化品格所共塑的时代精神,新的文化形态是对人性的审美本质的揭示、尊重与弘扬,审美教育让人的主体意识、情感获得自由展现;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学科建设是“经济个性”与“专家个性”取向的产物,不利于“完整的人”的培养。基于“文化个性”取向,在理念层面,学科发展应尊重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在建制层面,学科发展应在正式学院建制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无形学院”组织形态的作用。

关键词: 文化转型; 审美教育; 完整的人; 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1-0043-07

歌德说:“凡是希望成为最高尚的人,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1]这是对单向度的人、分裂的人、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的教育时弊的有力批判。学校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完整的人”是教育的宗旨,是对教育质量、人才标准的质性规定。在学科规训体制下长期培养单学科思维的专业人才是现代大学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在争创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学科的进程中,建大楼、引大师、育人才等举措的投入不可谓不高,但还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我们在通过学科建设追逐世界一流的道路上,走得较远却忘记了为何出发。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学科发展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如何发挥学科育人功能以回应文化形态的时代变迁?研究理当在这些问题编织的宏大背景下对学科建设与发展做理性而精进的思考。批判当下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学科建设思路,不是否认单一学科纵深发展的必

要性,而是强调沿着“文化—教育—人”^①这一逻辑出发,发挥学科的育人功能必然要求学科建设对时代精神予以积极回应,摒弃“经济个性”和“专家个性”思维,基于“文化个性”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将有助于大学学科建设在思维和行动两个方面做出更具发展性的决定。唯有如此,学科建设才是一项对大学发展而言富有生命力的“育人工程”。

一、文化转型:对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的艺术文化形态的预见

文化转型是指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逐渐消退,另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逐渐形成而替代原有文化形态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2],它是文化演进的必由之路。当一种文化形态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实施路径研究”(18JZD04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高校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机制研究”(18YJA880057)

作者简介: 刘亚敏,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大学文化与院校治理研究;夏施思,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高校审美教育。

居于主导地位,新的文化形态便孕育其中并逐渐生长,经历一个漫长的对旧有文化形态的审视、反思与批判的历程,而促进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社会实践领域和知识领域的整体变革,来实现对原有文化形态的扬弃,取而代之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文化转型意味着新旧文化形态之间的交错更替,而非发生断裂,它是对前一种文化形态的否定和发展。文化转型是由社会接纳的创新决定的,预见文化之转型,创发改革之先声,其改革行动往往造就时代典范。18、19世纪之交,德国在面临内忧外困之际发起大学改革,柏林大学率先以科学研究大旗宣告宗教文化形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科学文化形态的高扬,从而成为引领19世纪世界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旗手。毋庸讳言,越早敏感到文化形态变迁趋势的国家,就越能具备世界引领力;越早适应文化转型的教育,其育人功能就越强大。

人类文化经由宗教文化、科学文化,必将转向艺术文化。其中,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是“属体文化”,文化是属于人的,因而也称之为人类文化;而只有文化成为自主的事物,不再受人的控制,人类彻底文化化了,这时的文化超越于人类而存在,就是艺术文化,即“本体文化”。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历程经由宗教、科学、艺术这三个阶段的跃迁而表现为三种不同文化形态的更替,即宗教文化向科学文化,进而向艺术文化的转移。^[3]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情感与认识的发展关系决定的。情感与认识相混合的文化形态是宗教文化,此时人类具有尚不发达的思维能力,主观与客观、存在与观念、情感与理智尚未充分分化,因而在既需要认识自然而又对自然充满畏惧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以信仰为基本特色的文化形态。文化在分化中进化,随着人类思维意识发展,当认识因素与情感因素分开之后且前者占据了支配地位之时,科学文化替代了宗教文化。科学文化本质上属于认识性文化,它的根本功能是认识自然界和人类,进而改造自然与调和人类,通过所造就的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提高了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科学文化时代,虽然也有艺术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但后者尚未达到足以与科学文化抗衡的水平。当情感因素由弱到强,并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达起

来,就形成了独立的文化新形态,即艺术文化。艺术文化是一种超越了人类动物本能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本体文化,它是一种充分实现了意识(精神)与物质合二为一的文化。

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还不是制高点,因为科学文化在造就物质财富提高人类的力量时,又给人类套上了新的枷锁,造成了自然物质与人工物质的双重压迫和禁锢,并未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科学文化解放的主要是人的动物本质,只有富含情感内容和审美价值的审美文化,才是体现人的文化本质的文化。情感不是人的动物生命力,而主要是人的文化生命力,它是高尚的、自由的、博大的、完美的。审美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主体意识、情感的自由展现,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的艺术文化是可以让人的情感自由奔驰的原野和世界,是可以最大限度解放人、达致自由、臻于至善的世界。

进入21世纪,新的时代形态已为先知先觉者们所预见,于20世纪掀起的文化思潮以及当下高涨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识,其实就是孕育在科学文化母腹中的“艺术文化”的种子。文化转型悄然发生,与其说是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壮大,不如说是艺术文化的种子正在萌芽。这一文化转型彰显了由主体性、开放性、创造性、多元性、整体性、联系性、相对性等文化品格所共塑的时代精神,它为当下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与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石、提供了价值判据。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令世界瞩目。然而,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正确地回应经济社会转型,取决于我们对经济社会转型的质变做出正确的理解。概括起来,经济社会转型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人的发展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型要求从重物质生产、轻价值创造、忽视生产主体“人”的多种需求和创造潜能,转为“以人为本”,激发主体性,超越认识主体而培育价值主体。因此,经济转型要回答的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问题。对此,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最早认识到,后工业时代来临必须对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人”作一个新的理解。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

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发表了著名的观点:未来的帝国将是有头脑的帝国。这里的“有头脑的”意思就等同于“创意”,也可以说,有创意的大脑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正因为如此,为了挖掘国家发展的动力源,英国是最早将创意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那么何谓创意?产生创意的来源是什么?仅仅靠知识积累或者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均无法产生创意,而势必需要激发人内在的主体性、创造性、整体性。在崇尚认识成就与物质成就的科学文化时代,不可能源于人的本性创造一个超越物质的世界,因为真正的创造离不开审美情趣和主体自由意识,而这实质上是对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的艺术文化形态的呼唤。

二、审美教育:培育人的主体意识与审美情感

对文化转型的认知,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与领悟,究其实质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培育适应时代发展并引领时代发展的“完整的人”。在伊曼纽尔·康德看来,修养教化的意思是,人应该愈来愈成熟,越来越独立,自己塑造自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人的潜力”的概念,认为人的需要应当获得表达,蕴含在人自身中的发展潜力和个人的独特性应当充分被发掘出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以上活动都离不开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广袤的情感世界。主体是由主体意识、情感组成。在情感中,审美情感是其最高形态,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审美情感的形成是从动物到人类以及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审美价值尺度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价值取向,也是一种追求自由的价值尺度^[4],与之相较,科学文化的理性尺度本质上是一种对客体的崇拜,对主体的贬低,是一种求真、求实用的尺度,人往往不是作为目的而是被当作手段。因此,审美价值尺度追求的意识性、主体性目标,在科学价值尺度看来是虚幻的、无用的,审美活动在科学文化时代只被当作一种补充性的闲暇活动。显然,科学文化尚不足以让人的主体意识、情感获得充分的解放与自由,相反,科学文化越发展,主体

意识、情感所感受到的压抑越大。对此,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恰好影射了这一点:物质丰富、信息爆炸、节奏加快,导致精神式微的现象愈来愈引人注目,人们想要摆脱物的依附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现代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解放人、发展人及提升人的审美情感,是科学文化进化到艺术文化的助推力。同时,也只有求美的审美文化才能使主体意识、情感获得自由。虽然在科学文化求真、求实用的价值尺度中,也隐藏着求解放、求自由的内在追求,但唯有推动科学文化进化到艺术文化,主体价值才可能取代客体价值占据文化的统治地位。为此,在艺术文化到来的预见中,揭示、激发并高扬人性的审美本质是文化转型对教育转型提出的挑战。蔡元培在20世纪初提出的美育思想,也是对这一新的教育使命的先知先觉。人的审美能力的缺失和审美意识的淡薄,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日益突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科学文化“蜕化”之时正是艺术文化的萌生之际,而审美教育将发挥破旧立新的作用。

审美教育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需要的重要途径,培育人的主体意识与审美意识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人的主体意识自由离不开审美活动,马斯洛把人的审美活动和人性的自我完善联系在一起。审美超越的实质,是以审美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意识与物质的对立、人类与环境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当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的对立在审美中被超越了,人类与环境的对立在审美中就会消失不见,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也会被审美所抹杀。人的主体意识是以追求自由为本的,而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只能消灭前述四大对立才能完成。所以,以追求主体意识自由展现的审美必定要以超越以上四大对立为基本特征。具有审美意识且审美意识成为占主导地位意识的人,才是审美主体,而一个主要从事审美活动的人,必须拥有占有支配地位的审美意识,能依据审美意识去从事创造美的活动和欣赏美的活动。现代人之诞生于世,如果没有接受审美教育,没有审美意识,他就不可能投身于审美活动,也就不可能是审美主体。概言之,只有审美意识成为占主导地位意识的人才是审美主体,因

为审美意识是情感的升华和集中表现,是主体意识高度自由以至达到超越物质追求的境界的体现。

三、学科发展:以“文化个性”为取向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形态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与学科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文化形态变迁也为学科发展昭示了新的使命与新的方向。在精神生活领域,量子力学、相对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科学研究成果揭示了世界的开放性、创造性、多元性、相对性、联系性、自发性、运动性等本质特征,这是对牛顿机械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封闭的、僵化的、单一的、绝对的、孤立的、被动的、静止的现代世界观的否定和超越。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后工业文明呈现出了多元化、弹性化、开放性、无穷变化和普遍联系的生活形态。进而在知识领域,具有多样性、境遇性、个体性、相对性特征的后现代知识型动摇了以标准性、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型的霸权地位,而逐渐成长为当今时代的主导知识范式,它是一种更为民主、开放的知识型。^[5]然而,学科建制习惯对于学科发展力而言是一种局限。受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影响,学科建制的支点落在了“学科规训”上,一切学科活动主要以维护学科共同体和加固学科体系为职志,对于传统的学科而言如是,对于新兴的学科而言也如是,其地位毫无例外地是靠建构完整的学科体系得以确立。

科学的职能是认识世界,不同门类的学科都是从不同领域对世界进行认识的结果。如今,新兴的学科层出不穷,不断地促进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科建设对于科学文化的发达而言,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不过,回到学科发展本身上来,当下学科建设的主导性意志其实体现的是“经济个性”取向与“专家个性”取向。随着技术变化迅速而普遍,正如我们所见所感,一是专业化让融合性对话和开放式交流变得很困难,专业化使专业人士的头脑、身体、情感和精神难以融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自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个性和专家个性一直主宰着学科发展思维。经济个性的主

要问题是把人看作一个消费者、一件商品、一位追逐利益者和市场中的最大满足者^[6],这趋向于把个人当作屈从于市场利益的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为此,经济个性取向下的学科建设无法摆脱效率、速度、规模、可视化的奴役。二是在专家个性取向的决定下,个人趋向“朝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技能范围很窄的专业化方向发展”^[7]。世界问题越来越复杂,一个问题往往就涉及到诸多要素,如技术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精神要素等,经济个性和专家个性使个人的形象成为单维度的或单向度的,可是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多维的、综合的和开放的。学科思维形塑人的个性,因此根据这两种标准来判断人、规定人的行为是有害的,摆脱经济个性与专家个性取向的束缚,适应文化转型,朝向文化个性转变是未来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化个性是整体的,文化个性强调把所有组成部分融合成一个相关的和复合的整体,以“促成整体”为目的,强调“崇高地思考”,即乐意去思考各种行为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其他人、今后几代人,对自然万物的影响以及最后对宇宙的影响。文化个性取向下的学科发展,关注的不只是通过学科“规训”推动人作为认识(或思维)主体的发展,而更在于突出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发展,即人是“自由、目的、责任”的主体。如歌德所言,“你不能改变你生活的时代。但是,你能反抗它的趋势,并为其顺利发展奠定基础”^[8]。学科建设立足于学科发展的使命,理应有超越时代局限性的勇气,抛弃不符合未来时势的偏见,以培育完整的人和具有高度的人为法则。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框架下以学科建设为要务,学科建制强调学科内部的分化、交叉,以及学科领域内的“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如此作为,一方面使学科边界越来越坚固,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思维越来越僵化或窄化。事实上,从学科发展本身而言,学科发展到鼎盛之时正是学科需要突破封闭状态寻找生长点以求突破之时,从学科发展的育人功能而言,学科发展应当摒弃单学科中心主义之弊,致力于“完整的人”的养成。由此,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化个性”取向将决定学科发展的立场和前景。

首先,“文化个性”取向的学科发展,将尊重科学研究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将不同的学科理解为彼此独立、互不联系的知识体系,是违背知识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学科的发展内在于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

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矛盾统一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充实、创新与完善需要在跨学科视野的引导下,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加以完成,且很多学科的学科性以跨学科性的有效发挥作为自身不断壮大的前提和基础。以文学理论为例,20世纪文学理论先后借助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成果积极构建属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形态,从而呈现出跨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图景。^[9]由此,文学理论在保持自身学科特色的同时,通过跨学科视野与实践,有效地保证了理论知识的增长与不断创新,保持了理论对现实的敏锐性和阐释机制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跨学科性作为文学理论知识构成上的重要性质,不仅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理路与思想方法,而且也在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层面上显示出文学理论学科的兼容性与灵活程度。事实上,各门学科在明确学科外部界限的同时,针对某些问题的求解,其知识内部必然需要通过跨学科的关联达到系统化与综合化。就研究内容而言,各门学科之间呈现出明确的学科界限,但在共同研究目标的层面上,如果不能适时地借助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支持与帮助,各学科皆难以在本学科领域内获得全面而完整的知识,正如著名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所言,各种不同学科的现象领域之间的界限是灵活的、任意的,划分界限的依据是暂时的和权宜的。^[10]

学科分化一方面促使学科发展,但与此同时,学科发展又以学科的高度融合为旨趣。学科结构过于孤立和单调,就无法形成学科发展的环境和学科群体氛围,难以实现学科之间的互动、难以产生学科的协同效应。虽然大学的开放程度较之以往增强了许多,但是学科建设作为大学的龙头事业,大学的目光还只是停留在将某一单个学科做强、做大的思路,也就是说“单学科中心”的地位从未被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时代之趋势所动摇,所谓的学科交

流,只是局限于“多”(multi-)学科,或者“交叉”(cross-)学科这些阶段,而没有更前瞻性地走向融合意义上的“跨”(inter-)学科。“跨学科性”“交叉学科”和“多学科性”代表着学科合作的不同阶段。与多学科性、交叉学科不同,跨学科性包含了超越溢出一个学科的范围,是一种模糊学科之间界限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方法,或者是一种构架研究中专业知识和政策中普遍认识的方法。可见,跨学科旨在通过打破学科界限,利用学科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学科的整合,其特点彰显于开放性与动态性,强调学科合作、协同与高度融合。促进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是学科建设迎战“大学科”时代的挑战所应遵循的基本理念。

其次,学科发展依赖社会组织,在建制层面,文化个性取向的学科发展应在学院建制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无形学院”组织形态的作用。

学科发展与社会组织之间彼此作用的关系,早为20世纪60年代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所证实。学科发展所依赖的“科学共同体”是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所组成,这些社会组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正式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单一的学科和专业,不同学科或专业都有自己的正式交流渠道,如专业学会、专业学术期刊。在正式组织产生的影响下出现的各种研究网络或社会群体构成了非正式组织,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在成名作《小科学、大科学》中把非正式的交流群体称为“无形学院”,即从正式的学术组织中派生出来的非正式学术群体,其群体成员彼此保持不间断的接触、合作研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在普赖斯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无形学院”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影响,揭示了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社会组织的关系,从而指出“无形学院”的组织理念和组织形式,决定着科学知识的发展。^[11]近些年,受学科融合、跨界合作日盛的影响,“无形学院”再度为学界关注,它被认为是促进当代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重要组织形态,其功能不断得到正视和挖掘。“无形学院”具有创造功能,如人才凝聚功能、知识互补功能、潜人才开发功能^[12],与正式的学院建制相比,具有有效跨越学科边界的功能^[13]等等。

科学研究呈现两大趋势:一种是高度专门化,即着力于形成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以保证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增长。这种做法是相对封闭的;另一种是接受外来思想,以尊重现代科学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的原则为前提,广泛地推动着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受这一趋势影响,科学知识呈现指数增长。对后一种趋势起到促进作用的便是无形学院。在历史上,“无形学院”不仅推动了科学活动正式化和制度化,而且作为大科学背景下科学家关系的表达方式,它对科学知识增长、提升科学研究和科学交流效率作用显著。“无形学院”尊重互有差异的思想交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认知的形态,具有促进学科发展、取得科学研究前沿进步的作用。科学领域内部重叠、交叉的布局就像“鱼鳞”,由此形成诸多跨学科研究领域,而整个科学又似一个蜂房,每一个学科就是一个小室,彼此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学科创新,大学这一学术体系应具有扩展能力,即有预见性地吸收创新成果并允许其发展的能力。为此,大学就不能囿于现有的院系壁垒,阻碍跨学科研究或知识的跨学科扩散。

学科之间的区隔和边界随着学科发展到鼎盛就越来越坚固,往往已经不是学科自身的选择,而是“守门人”人为设置窠臼造成的。学科对话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现有的社会分工与部门形态主要以传统的学科专业化制度为基础,为此,在现阶段完全打破原有的院系建制是不现实的。“无形学院”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在大科学背景下,也是科学结构和科学家关系的一种折射,通过这一非正式社会组织形态,增进学者群体网络关系,提升科学研究和科学交流效率,进而培养具有复杂性思维、科际整合思维与素质的人才,将是学科发展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必由之路。

注释

- ① 张应强教授以“文化—教育—人”为研究框架揭示了教育、文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论证了教育的本质是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和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这两个基本命题。参见张应强:《文化视野里的高等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9-33页。

参考文献

- [1] D. 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7.
- [2] 侯立平.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6.
- [3] 韩民青.文化的历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13.
- [4] 韩民青.文化的历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3.
- [5] 侯立平.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236.
- [6] D. 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0.
- [7] D. 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1.
- [8] D. 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61.
- [9] 李震.文学理论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对“文字理论边界”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37-141.
- [10] 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M].石天曙,滕守尧,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233.
- [11] 戴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M].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12] 王克君.从科学史看无形学院对科学发展的作用[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22-124.
- [13] 袁曦临,刘利.从“有形学院”到“无形学院”——高校智库建设的逻辑与组织结构模型[J].情报资料工作,2019(3):6-12.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ary-Developing Orientation

Liu Yamin Xia Shisi

Abstract: Following the logic relationship of culture-education-human, to think about culture transformation's effect on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then examine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ing orientation, which would help disciplinary construct make the most developmental decisions. Culture transformation reveals a spirit of the age shaped by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subjectivity, openness, creativity, diversity, integrity, correlation and relativity. The new cultural pattern is to find, to respect, and to carry forward the human's aesthetic essenc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would let people conduct their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 based on single disciplinary-centered is determined by economic personality and experts personalit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cultivate a complete person. Nowadays, disciplinary construct should be guided by cultural personality to respect the unity of 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d strong informal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invisible college concep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well-rounded pers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